

重庆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33412

重庆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辑

YT17518



K
250.6
200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〇年九月

重庆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重庆印制第一厂印刷
1980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内部发行
定价：0.76元

目 录

四川防区时代的财政税收	甘绩镛遗作	(1)
一、辛亥革命前后时期的四川财政.....		(1)
二、防区时代的财政机构.....		(5)
三、各种苛捐杂税.....		(9)
四、大量发行公债库券.....		(53)
五、防区时代的收支概况.....		(57)
六、债 务.....		(61)
刘航琛其人	宁芷邨 马绍周 李时辅	(65)
一、“爱人堂”的后裔.....		(65)
二、刘湘的聚敛能臣.....		(66)
三、工商界的“木匠”		(83)
四、蒋家王朝的随葬品.....		(96)
回顾四川美丰银行	康心如遗作	(101)
一、中美合资时期 (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七年)		(101)
二、投靠地方军阀时期 (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五年)		(125)
三、从发展壮大走上覆灭道路 (一九三五年——一九五〇年)		(163)

四川防区时代的财政税收*

甘绩镛遗作

辛亥革命，推倒清朝，四川人民方幸脱离封建专制的枷锁。然以后数十年间，地方军阀扰乱于前，国民党反动统治盘踞于后，人民困苦不堪言状，其中尤以根于财政之事者为多，爰就所见所闻，概述于后，以备追维四川往事者作为参考。

一、辛亥革命前后时期的四川财政

清朝专制，庶政集权于中枢。各省赋税之征课，统由户部规划，责成各省督抚，督饬藩司照额征解。而支出则率由各省就收入税款坐支，报由户部核销，无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区别。清末维新派力图整顿，设置清理财政局，遣派各省财政监理官，各省皆有年报、季报、月报，一扫从前外销凌乱无序之陋规，更进而编制宣统四年之预算提付咨议局审核。川省财政之体系，未及建立，而清朝已亡。

辛亥革命至民国五年(1916年)间，如财政制度之建立，国地收支之划分，税捐之兴革，货币之扩充，以及整理公产，设立金库，编制预算等，不遗余力，四川财政由此初具规模。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袭专制之余威，权力渐及于各省。民国二年至民国四年(1913年——1915年)，川政亦渐趋统一。民国四年春，陈宦

* 本文摘自甘绩镛遗作《解放前四十年之四川财政》。标题是编者加的。——编者

入川，大军云集，需款浩繁，尚能裁编军队，挹彼注兹，收支平衡，不增岁入。至护国军兴，事出仓卒，虽曾就地截留税款，以维军精，然而财政大权，犹未旁落。民国五年（1916年）罗佩金继蔡锷督川，其时，川军增至五师外，又有滇黔军队，饷款有增无已。罗佩金继任之初，即令各县征收局长将所有税款概解各道转拨军饷，至是财政系统无形破坏。以后军区截留税款，破坏财政系统之风，兆基于此。

罗佩金令各道拨饷，隐开防区制之端。民国六年（1917年）借用中央盐税以充军用，复启截留国税之渐。且揩勒川军饷款，日久不发，更进而使各军趋向就地自谋之途。继以刘存厚、罗佩金战起，事权不一，各军不候省令支援饷款，遂行就地自行提用。此后，自由提款日益加甚，乃由财政厅按各军每月实支确数填具军用通行支票，送由督署分发各军，自就各县局拨用。实行伊始又值刘存厚与戴戡之战，难于推进。民国七年（1918年）靖国军兴，需款孔急，就地截留税款，相沿未已。民国八年（1919年）熊克武督川，乃规定军费三联拨款凭单，指定各军饷款，概就驻防县局拨给，并指定军队驻地各县分筹军饷数十万元分拨各驻军。由于年来驻军自由宰割，寢习成风，各县局拨支款目亦多未报。旋因战事又起，财政系统亦因战区分裂，愈趋破坏。

民国九年（1920年）川、滇、黔战起，川局混乱。是年九月，第五师师长吕超以川军总司令名义入川，中经扰攘，政务大都废弛，战区分裂，财政更形紊乱。前一二年之预征借垫潜滋暗长，至此则公开实行。以前收缴军票兑券，此后则公债钞票相继发行，甚至扫卖官公营产，搜用城乡积谷以供军用。各县亦因支用浩繁，开始超额附征田赋。后至滇黔军出境，始在重庆组织各军联合办事处以维现状。一般称为防区制，至此已实际形成。

民国十年（1921年）四川宣布自治，开始形成川军割据局面。当时公推刘湘任四川各军总司令兼省长，同时组织军费审查

会，点编枪枝，规定饷款。复成立四川财政统筹处，厘订拨支军费条例，填发拨支军费凭单，通令各军不得擅提税款，拨给伙饷亦须自行拨还抵扣。民国十一年（1922年）刘湘下野，此项办法旋即变更。同年，刘存勋任川军总司令，召集军事善后会议议决军费以枪枝为标准，于点验后以国家、地方两税收入总数，除去政学制宪及预征预垫各款，再由总司令部匀摊支发，并由财政厅提出整理计划以谋清厘，而川战又起，成效未著。民国十四年（1925年）川战告一结束，川康边务督办兼四川军务善后事宜刘湘、四川省长赖心辉，于是年十二月在成都召开善后会议，集各县选派代表与川中硕望绅耆邵明叔、张表方、罗纶、叶秉诚、黄墨涵、尹仲锡、周萃池、徐子休、梅泰雨等及各军代表于一堂，此为辛亥革命以来军民联合最扩大之一次会议。首由刘湘函交军事善后案，提出统筹饷项，切实收束，减裁浮滥，实行点验，划一编制，厉行垦筑等十二条款。选出邵明叔为议长，先后经过七十余日，制成四川善后公约、四川军事善后、四川财政善后、军政费收支概算等案，并选出财政监理委员。同年，成立四川财政清理处，财政厅长黄云鹏兼任处长，就清理所得编订《四川财政录》，厘正始基，足供整理四川财政之借镜。而善后会议各议决策案中，如收束军队、停止招募，停造枪弹，统一财政，停止预征借垫及苛捐杂税等，皆当时人民之所殷望急切实行者，诚为四川财政改进之一大好时机。乃会议方兴，而兵工厂造枪如故，外间之招募如故，更发现几多防区反趁善后会议时期，临时自由筹款，虽善后会议先后有严正之电文宣言，终于难返积重之锢习，一切又成画饼。

四川善后会议之决议无法施行后，政治已无统一权能之体系，财政愈乏统一收支之机能。军区不但旧习如常，转而变本加厉。往昔省府财厅虽不能发挥其应有权力，而各军对于财政体系之观念犹存，征收机关尚能多有以驻军支款印收，向财厅抵解者。此后各

军更肆行把持驻区行政财政以欵财扩军，对于川省军民财政之整个问题，不复提及。而征收官吏亦由各军自行委任，挟驻军之势力尽量搜刮税款以供军用，人民之困苦亦由此而日增。至蒋介石发表各军首领为国民革命军军长，无统一军政之人，各军更显然形成均势，割据自雄，各个独立之单位，成为天然自由系统而为所欲为，四川财政规模法度荡然无存，财厅则流为典守印信之机关而已。迄蒋介石主政南京，政治权力渐及川省。民国十七年（1928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划分国地收支标准，又改各省省长制为委员制，并于是一月三十一日任命刘文辉、刘湘、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吕超、谢持、任鸿隽、向传义、黄复生、卢师谛、熊炳、卢仲琳为委员，刘文辉为主席。并设川省裁兵委员会，派刘湘、邓锡侯、刘存厚、田颂尧、赖心辉、郭汝栋、杨森、胡若愚为委员，刘湘为委员长，邓锡侯、刘存厚副之。此又川省裁减军队，统一财政之大好时机。其时，重庆民众督促会对新省府、裁兵委员会曾有严正沉痛之宣告，切望健全川政，裁编军队，废除苛杂，打破分区。然四川自形成分区制起，争利争雄，变幻百出，人民之呼号痛苦，久已置若罔闻，省府亦曾通电军区，关于全省政治设施应由省府主持，而军区旧习依然，不久战事又作。凡此数年中，各军财政之详细概况以及收支实数，实难查考。但就一般现象观之，预征借垫有加于前。即以安岳一县为例，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时，全年供给军队一项，实在一百五十万银元左右；又如安县自民国十四年八月起至二十三年底止（1925年8月——1934年12月），不到九年，县局征派收入之款已达一千四百零八万余元。加之劣币充斥，金融混乱，苛捐杂税林立，纸币债券风行，人民之痛苦，非文字所能尽述。

综上所述，可见四川财政民初粗具规模，民国五年以后，因军事影响财政系统渐趋破坏。加以军区割据，长军者更以军统政，以政欵财，以财扩军。辗转虐民，日益滋甚。竭川民之财，

无可言之政。其间虽于教育、交通事业之发展，生产建设之提倡曾有表现，然皆枝节为之。政治缺整个之计划，财政甚少适当之收支，驯至养兵至四十余万之多，大小数百战，互争雄长，总计全川军政各费，多者年达一万余万元以上。正供之不足，继之以借垫、借征、苛捐、重税、举债、发钞种种搜刮以为弥补。凡此皆由川局之不统一，川局之不统一实由中枢政局纷歧，时起变化。执政者多恃其国际背景以相争夺。袁世凯篡窃政权后，直系、皖系、奉系以迄蒋介石，复造成中国内战，各省军人每因自利以受其利用，从而又酿成省内纷争，类此情形，亦为川战不息的主因之一。财政之理乱，恒视军政为转移，追求祸始，毒害人民，以致财政达于极度紊乱者，封建残余大小军阀为之，而另一方面则由帝国主义之支柱为之。

二、分区时代的财政机构

从清末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期间，四川财务行政机关属于省级范围者，其组织合法的，有财政厅、四川金库、各县征收局。统捐局、糖税局、省教育经费收支处、各县地方收支所。属于中央范围者，有盐运使署、海关、常关、印花税处、烟酒公卖局。兹仅叙财政厅、四川金库、各县征收局、省教育经费收支处、各县地方收支所等如下。

（1）财政厅的沿革及其组织 中国财政，在清代无地方国家之别，统隶于中枢，户部掌管全国之财政，各省税收统归藩司管辖。清末，赵尔巽督川，始设经征总局，隶于藩署，专司考核各县经征分局之征解事项，但一省实权，仍操之藩司。民国成立，仍就经征总局地址，设财政部，隶属于川军政府。旋因中央共和政府成立，四川军政府改为都督府，财政部亦改名财政司。民国二年（1913年）北京政府成立，规定省制，军民分治，设立省行

政公署，财政司遂并入省府，对外用民政长名义行文。同年五月，划分国地两税，以田赋附加及杂捐二十目为地方税，由财政司主管。以田赋、契税、常关、统捐、烟酒、茶糖、牙、当等税为国税，另设国税厅筹备处管辖之。民国三年（1914年）六月，北京政府令将司处归并，改设财政厅，于是年十一月改组成立，此为财政厅之重要沿革。

财政厅直隶于财政部，置厅长一人，管理全省财政，监督所属职员暨兼管征收之各县知事。厅内则分设总务、征榷、制用三科。总务科分设文牍、函件、交代、编辑、票据、统计、银行、货币、收发、监印、收支、审核庶务、官产各股。征榷科分设租赋、契税、税捐、肉税、酒税、油税、糖税、边茶、矿税、杂课、营业税、官案各股。制用科分设政费、军需、编制、编协、库储各股。迄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省府改组以前，无大变更。但在川军割据时代，军区把持行政财政，征收机关人员之任免奖罚，概由军区自主，即收支表报，亦不报厅，而机关仅同虚设。

（2）四川金库的沿革及其组织 辛亥（1911年）革命之初，川省所有一切收支事务，悉由财政部直接办理。自民国元年（1912年）改司以后，始于是年十月，就四川银行附设四川金库，并设分金库于重庆，掌理全省岁出岁入之款。其属于收入者，系由缴解款项各机关，先将缴解公文报由财政司考核相符，然后解库照收。其属于支出者，仍由司核准后发给领款凭单，交领款人赴库领取，月终由库结明，分造收支各表，呈由财政司转报审计院查核。至四川银行停业，瀘川源银行复兴，金库事务，遂移归瀘行代理。民国二年（1913年）国税厅筹备处成立，国家收支由国税厅办理，地方收支由财政司办理。民国三年（1914年）六月，合厅与司，改设为财政厅，于是国地两税，统归财厅办理。其出纳保管事务仍委瀘川源银行代理，而其办法大致与前无异。民国四年（1915年）五月，黄国煊长财厅，因瀘川源银行附设之

四川金库，其制未善，另定名为成都分金库，定出纳款项简章三十七条，委托其事于中国银行，此项简章，据其第三十六条所载，系依据财政部金库简章，参照本省情形，由财政厅与中国银行协商订定，虽较旧章详略有殊，其宗旨则仍旧未变，至民国六年（1917年）黄大暹为财政厅长，以川省迭经战事，收支款目，不免混淆，始将库款经理处（黄国暄时设立）裁撤，分设会计、收款、发款各股于各科。于成都、重庆、万县等处中国银行，复设分支金库，举中央专款、库储各款交金库代收。其本省专款，则由中行代收。至各机关请领款项，统由附近各分支金库代取其书据送厅登记，同年七月，钟志鸿任财政厅长，又将本省专款，改由瀘行代收。民国七年（1918年）三月，肖德明任财政厅长，因成渝各中行停业，遂将金库事务，改由瀘川源银行代理，定名为瀘川源总银行代理金库。其组织出纳程序不无变更。及民国九年（1920年）九月，该行总理去职，乃由曾宝森厅长，商之成都卫戍司令将该行接收，由厅委员管理。民国十三年（1924年）三月，蔡家骧任财政厅长，时杨森以前二军军长兼摄民政事务名义，指派周炳麟为金库主任，然以各县俱属驻军防区，税款已就地指拨，金库形同虚设，随仍归还瀘行接管。民国十四年（1925年）重庆联军入省，联合办事处委员接收瀘行独立办理。民国十五年（1926年）黄云鹏任财政厅长，仍将该行收归厅办，以省经费，其金库亦照旧制。此后因军区自由宰割，财厅等于虚设，金库亦无形消灭。

（3）各县征收局之设置 川省各项税收，昔由各州县官总理一切，清末设置经征分局，直隶于经征总局，凡粮税、契税、肉税、烟酒税皆属之。弊病繁多，颇招民怨，以故辛亥同志军兴，捣毁各地征收局卡。民国建立，川军政府与人民更始，撤废经征分局，各县一律改设征收课，课长民选，隶属于县知事。民国二年（1913年）五月，国税厅筹备处成立，乃将征收课改为征收

局。局长、局员概由处委。同年九月，复将局员裁撤，局务悉由局长主持，以一权责。此后虽相沿无改，但至川军割据时，税政破坏，或则任意更名，或则分立机关，如以县知事兼征收局长，改原设局长为副局长，并于乡镇增设副乡镇长，力图加紧催科之类，民间诟病，甚于清末。

(4) 省教育经费收支处的沿革及其组织 民国十一年

(1922年)四川各军总司令兼省长刘湘召集全川教育会议于重庆，鉴于驻军截留税款，教育经费无着，决议划拨全川肉税为教育专款，规划教育经费独立。设立四川省教育经费收支处，独立收支，于重庆、泸县各设特派员，分管川东川南征解事宜。并规定该处有督饬全省经管教育经费人员，整顿肉税收入，改良税法，审核各属肉税附加之权，及因教育计划实施之需要，筹集特别款项。至民国十三年(1942年)时，因事权不一，收款多被军区截留或自行征用，乃由驻省将领共同商议，改四川省教育经费收支处为四川省教育经费收支委员会。各军委员共同征收，驻泸特派处无形消灭。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刘湘部队进驻川南，其时四川省教育经费收支委员会已不存在，驻渝特派员虽尚能行使职权，但其名义则无所附丽。于是就二十一军戌区内设立四川省教育经费川东南收支处。划区内各县肉税为教育专款，委军部政务处长甘绩镛兼任处长，四川省教育经费收支处驻渝特派员雷沣任副处长。规定收支处对戌区各县肉税附加，有审核之权，行文用令，以期敏捷而一事权。同年，各军亦类此办法，在成都设立四川省教育经费川西北收支处，委刘堃南为处长。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省府改组，仍拨肉税为教育专款，令教育厅接办。是年五月，省府为统一财政征收事宜，乃改令财政厅接收办理，终止教经独立之办法。

(5) 各县地方税收支所之设立 川省各县地方征收附加各税，原为本县办理学务、实业、慈善、团警、司法等费用，从前

系由征收局代收，拨交地方分用。民国十年（1921年）十月，兼省长刘湘改设各县地方税收支所，凡地方一切附加税，统归该所独立收支，将从前原设之地方收支机关概行并入该所办理。并定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一月一日，全川实行。自此以后，各县地方税概归各县自行经收，不与国家税收机关混合，四川的县地方财政之独立，肇基于此。后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南京政府规定改组县政府，各军区乃先后改设财政局、或财务局、或财政科，此制始废。

三、各种苛捐杂税

（一）税捐的沿革

四川税收，在清末时，计有田赋、盐税、关税、契税、茶税、糖税、矿税、烟酒税、肉厘、当课、牙税、百货厘金、碾、榷、磨课等。每年约共收银一千七百余万两。民国二年（1913年）春，北京政府厘定国省税法草案，定田赋等十七目为国税，田赋附加等二十目为地方税（详附表），举田赋、盐税、契税、统捐等大宗收入，划归国税范围，各税收中有未经开办，或已开办而收入极微者，均无足述。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一月，南京政府颁订国家地方收支划分标准，复将关税、盐税、糖税、烟酒税、印花税等划归国家收入，田赋、契税、牙税、当税、屠宰税、房捐、营业税等划归地方收入。川省税源得以确定。时值川军割据，未克实行。兹仅就盐税、关税、烟酒税、印花税、矿税、田赋、契税、屠宰税、茶税、糖税、油税、牙税典当税、统捐、禁烟、附加及各项苛杂税捐等十六项分别叙述。至于各项税收，每年全川实共收入若干，无从查考。

附国家税地方税区分表

国家税：（1）田赋、（2）盐税、（3）关税、（4）常关、（5）统捐、（6）厘金、（7）矿税、（8）契税、（9）牙税、（10）当税、（11）牙捐、（12）常捐、（13）烟税、（14）酒税、（15）茶税、（16）糖税、（17）渔业税。

地方税：（1）田赋附加税、（2）商税、（3）牲畜税、（4）粮米捐、（5）土膏捐、（6）油捐及酱油油捐、（7）船捐、（8）杂货捐、（9）店捐、（10）房捐、（11）戏捐、（12）车捐、（13）乐户捐、（14）茶馆捐、（15）饭铺捐、（16）肉捐、（17）渔捐、（18）屠捐、（19）夫行捐、（20）其他之杂税杂捐。

（二）国 税

（1）盐 税

甲、盐务行政 川省盐务行政，清初由布政使司主持，及盐引法行，创设盐道管理，至光绪中叶，始设官运总局，置盐运使，以专理其事。民初设盐政部，旋改盐务局，为时均暂。民国三年（1914年）仍复盐运使旧称，其时川南川北，已分设稽核分所，因增置川北运付一缺，自是税政各有专司。民国五年（1916年）川北运付及分所相继裁并，于是川南川北两区复合为一。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四月，全国盐务机关改为一元制，裁撤四川盐运使，就四川盐务稽核分所改组为四川盐政管理局，于是税政复归统一。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西康建省，原隶川省之西康雅安两属，均属康省范围，因此改称川康盐务管理局，辖有重庆、五通桥、川北、康定四分局，全区二十四场，除富荣东西两场及资中场，管理局直辖外，其余各场，划分各分局管辖。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改行盐专卖制，划分川康辖区为川康区、川东区、川北区，仍称盐务管理局。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

川东区前所辖各场，仍划归川康区管辖。

乙、盐税的沿革 四川盐税，清初分引盐与票盐两种，在顺治时，四川省尚行票盐，因道梗销微，故至康熙间，复由户部领引到川，设盐道管理之。引分水引陆引两种，由产盐州县招商配运，自此而引票并行。票盐历系自由贩运，迄无变更。引盐初为商运商销，至雍正七年，改为计口授盐，行引制。光绪时改为官运商销制，设官运总局于成都，专理其事。辛亥改革，四川盐政部成立，破除引案，创为就场征税之法，任商民自由贩运，就场征税，一税之后任其所之。因其时川局犹未统一，盐政部管理范围，仅及犍乐资简仁井及川北各场，推行未久，困难迭出。至民国元年（1912年）四月改部为局时，川局已值统一，盐场亦经完全接收，乃统筹全局，更定税章，又因边地路远，运商裹足而销路顿挫，税收锐减。民国三年（1914年）复设盐运使署，运使晏安澜乃呈准恢复前清引盐分厂分岸办法，依引岸创设十八运盐公司，试行专卖制度。同时增加税章，结果成绩甚佳。然其时北京稽核总所业已成立，洋员丁恩、施泰老先后来川调查，对于公司制度，力持反对。试办一年，期满撤销。民国五年至十四年（1916年至1925年）遂改行商民自由贩运制度，而存分厂分岸办法。自由贩运，边岸每苦滞运，破引存岸，则互相侵销，于是销量停滞，收入短少，又因防区制形成，盐税拨充军饷，而自由贩运，税款淡旺不均。以故民国十四年（1925年）后，又改为包商制度。其制场岸均存，税款则由商按月包缴，既可按数取盈，事又整而且简。然此亦不过为军方之便，其实际则包商乃捐买勒卖，以操纵灶户，剥削人民，结果肥商而官民交病。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税政统一，稽核分所缪秋杰兼任运使，鉴于包商制之失，力主取消。于是呈准财政部，于是年五月起，恢复自由贸易制度，于一两年间，先后将富荣犍乐各场引盐，改行统制自由办法。以自由贸易为原则，场商及运销商，分别合组团体，负责统购统运，

其运销岸区场价以及行销轮次，均由官厅统制，即所谓核价轮销。其主旨旨在谋供需适合，平价疏销，以防垄断居奇之弊。复以川盐向行等差税，不合新盐法均税之旨，则更调整税章，使渐平衡，行之颇著成效。迄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川盐税制，已渐上轨道，兼以抗战时，各方需盐殷切，川盐销场日广，已无产场过剩、岸盐过积之不良现象。统购配运，亦有改正必要。因此，川康区盐务管理局，拟定川康区边计各岸引盐试办招商代办暂行规程，呈准财部，于是年八月开始招商代办，此项办法，一方面为以后实行官运之准备，一方面仍在相当限度以内，尽容纳向营盐运之正当商人，以资兼顾。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一月起，改行专卖，其目的在于促进生产，改良制造，调剂供需，稳定盐价。其办法则为民制、官收、官运、商销。在民制方面，规定盐为国有，人民经政府许可得以制造，制盐人对于政府规定产额必须遵照产足，以及制法盐质分配，暨其有关产制事宜，亦均由政府统制管理。在官收方面，所有制成之盐，悉数缴仓，由政府按其成本，酌加利润，核定场价，照额收购，不许私自受让。在官运方面，除近场各地得就场办理发售外，其距程远者，由政府自运，或以招商代运及委托运商方式统制移运，以吸收原有商人之人力物力，资为运用。惟关于运盐起讫地点、期限、盐量及其有关运输事宜，均仍由政府统制管理。在商销方面，彻底废除专商引岸及其他关于私人独占盐业之特殊待遇及权益，盐之分配、存储、应销，由政府随时体察交通道路环境与盐业供需各种情况，统筹核定，设立集散处所，酌配盐量运屯分销。其发售事宜，以批交依法组织之合作社或商人等办理为原则，必要时政府得设机构办理。所有经营盐额、地点、期限、盐价及其他有关销售事项，均由政府管理。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废止专卖制，仍改行征税。

丙、产场及产量

产地 产盐区域曰场，清末总名盐厂，光绪时共有二十二厂。民初改厂为场，划一场制。分川南川北两区，属川南区者，许有富荣、邓关、犍为、乐山、井仁、资中、盐源、云阳、大宁、开县、彭水、大足、奉节、忠县、万县等十五场。属于川北区者，有三台、南阆、西盐、南盐、射洪、射蓬、蓬中、蓬遂、乐至、中江、绵阳、简阳等十二场。合共二十七场。嗣后迭有损益。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时所有者，则为富荣东场、富荣西场、资中场、犍为场、乐山场、井仁场、盐源场、云阳场、大宁场、奉节场、开县场、彭水场、忠县场、大足场、射洪场、南阆场、三台场、绵阳场、简阳场、乐至场、蓬溪场、河边场、西充场、盐亭场等二十四场。抗战时期，为便于整理场产计，又将四川产区分为川康、川东、川北三区。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时，川康区实辖自流井、贡井、犍为、乐山、资中、井仁、大足、彭水、忠县、盐源、筠连等十一场。川东区辖云阳、大宁、奉节、开县、长滩井等五场。川北区辖南阆、射蓬、三台、乐至、蓬溪、河边、南充、盐亭、简阳等九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财政复员，仍将川东区各场划归川康区管辖。

产量 四川每年产盐，川南区约五百万担，川北区约一百五十万担，约共六百五十万担。各场产量以富荣为最大，年产三百万担以上，占总产量百分之五十。犍为次之，占百分之九。乐山、云阳又次之，占百分之七点五。其他小场仅百分之一二。此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以前之大概情形。抗战期间，我国产盐区域，大半沦陷，因而开辟卤源，改良产制技术，积极增产。计民国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1943年至1946年），每年总产量均在八百数十万担。仍以川康区为最多，如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产量六百四十余万担，几等于过去川盐全年产量，其次为川北区，再次为川东区。

丁、销岸及销额